



找准“内卷式”竞争的破解之道

提问：付剑伟 新疆供销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请问，“内卷式”竞争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哪些影响，如何整治和解决？

解读：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内卷式”竞争现象实际上描述了一种过度竞争的状态，其中资源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导致无效的內部消耗和可能的恶性竞争环境。我国“内卷式”竞争现象主要发生在一般制造业领域，长期存在着“扩大产能—化解产能—产能继续扩张”的治理难题。地方招商引资政策也存在“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的低水平让利竞争现象。当前，落后低效产能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卷式”竞争，是阻碍经济进入正常发展序列的主要因素。防止“内卷式”竞争，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形式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内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供需失衡下的价格混战。产能扩张远超市场容量增长，引发恶性价格战。当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或供给能力显著超过其市场容量的扩张速度时，每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都在不断缩小。以汽车行业为例，“造车容易，卖车难”，这句话反映了当前汽车行业产能扩张的速度过快、市场跟不上以及竞争空前激烈的现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显示，2023年汽车经销商亏损比例为43.5%，盈利比例为37.6%，较2022年亏损面收窄1.7%，盈利面扩大7.9%。但在经销商利润结构中，新车销售亏损严重，毛利贡献为-15.6%，售后和金融保险及衍生业务毛利贡献占比提升。2024年1—7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一直在50%以上，6月份达到62.3%。“价格混战”是汽车行业反噬利润率的主要原因，库存压力增大、市场供过于求是价格战的导火索。

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要素投入的边

际收益递减，直至边际收益降至零或变为负值。在过去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之间为了吸引大项目，竞相提供优惠条件，如“三免两减半”“五免五减半”等政策，不仅牺牲了要素投入的合理报酬，损害了国家利益，还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招商引资行为，不仅使利益过多流向资本所有者，还滋生了大量为获取项目利益一拥而上的群体，进而导致产能过剩。

创新缺失下的同质化竞争。在缺乏创新的环境中，技术依赖模仿，产品缺乏差异化，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同质性竞争，并最终演变为恶价格战。由于同质性竞争的产品缺乏差异化和定价能力，企业无法通过产品特性来控制市场份额，因此也无法提高价格，只能通过降低价格来竞争。

“内卷式”竞争的深层成因

从技术层面来看，行业的技术创新停滞与路径依赖，使企业无法突破旧有的技术范式，被锁定在旧技术轨道，构成同质化竞争。如光伏行业依赖成熟工艺，工艺创新不足导致同质化扩产；制造业“硬硬偏软”，工业软件底层技术受制于人。

从供需结构来看，外需波动叠加内需不足造成供需结构的失衡，致使制造业产能过剩难以消化。此外，我国长期定位为世界供给中心，目前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完全建立，居民消费受制于社会保障不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完全释放。

从制度层面来看，产业政策与行政区分割格局对于推进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产业循环体系产生困扰。具体来说，行政区城格局让竞争主要在块状经济之间展开。在块状经济内部，协调机制往往在行政命令与市场协调的混合体，而外部协调机制则主要依赖于地区间的行政关系。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也放大了产能容易出现过剩的制度性成本。内卷其实也跟中国企业的竞争战略理念有关。经常看到，某些行业的产能并未过剩，内卷现象却依然存在。因为一些企业秉持竞争的零和博弈观念。

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路径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企业的自主性、决策独立性建设，实施硬预算约束。没有硬预算约束，企业就不会谨慎使用资源，也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企业无法在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另外就是进行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从权力制约、职能分离等方面，依据法治化来慢慢解决。在国家宏观层面，需要产业政策转型来对待。

支持产业政策向前端转移，而非后端的产能复制。面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产业政策应当更加注重支持前端的研发与创新。尽管这可能导致一定资源的重复投入，但实际上这是技术进步所必需的成本与代价。一旦有企业通过研发取得成果并申请专利后，其他企业就会自然退出。

调整产业政策补贴的方向。以往的政策多倾向于补贴生产者，这种做法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寻租与腐败。当前政策应转向补贴消费者、用户和客户，以此来扩大市场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

缓解“内卷”问题。

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转型。过去的做法主要是挑选输家与赢家，事先不通过竞争就选择性地支持那些被认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种做法除了造成不公平之外，也会助长产能过剩。当前产业政策应当支持创造有利的、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而不是单纯地支持特定企业。

产业政策实施的主体上移。应与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相结合，将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转变为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这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政策职能继续由地方政府主导，市场被地方政府的产业竞争手段分割成块状结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形成。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回归计划经济，而是要减少产业政策的数量，让中央政府集中资源支持几个关键产业。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产业政策通常都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很少涉足。我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产业政策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并非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是参与市场竞争，这导致了市场的分割。因此，将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放在中央层面统一执行，有利于实现规则的一致性、政策的统一性和行动的协调性。此外，对产业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方向，是产业政策竞争化使用。一方面是把产业政策当成强化竞争能力和技术突破来推动，另一方面是运用竞争政策实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的。这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内卷式”竞争本质是市场机制失灵与政策扭曲叠加的结果。实现破局则需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行政分割，以创新驱动打破低端锁定，以制度变革约束非理性扩张。唯有如此，方能将“内卷”压力转化为“外拓”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长江，多次沿江考察调研，先后4次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任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早日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部署。新征程上，我们牢记殷切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进一步做好长江大保护工作，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统筹治污、治岸、治渔，展现长江生态之美。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和生态屏障，必须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建立健全长江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长效机制，推动长江干支流入河排污口整治常态化长效，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完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联合监管执法、司法协作等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区，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智慧环保”建设，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监测和治理，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持续推进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加快长江流域国土绿化，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改革，提升长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江豚等长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坚持岸线协同治理，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努力建设安澜长江。

统筹保护、传承、弘扬，展现长江文化之美。长江是中华民族摇篮，哺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辉煌的长江文化。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进长江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文化建相融共进，让长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协同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工程，加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强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构建长江文化标识体系，加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长江文化交流传播，通过举办长江文化论坛、建立长江文化城市联盟、推出长江文化文艺精品等形式，共同讲好长江故事、弘扬长江文化。统筹山脉、水脉、文脉，大力推动长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展现长江绿色发展之美。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守护好『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使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保护相得益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严格执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和规划许可，优化生态、农业、城镇、港口、岸线等各类空间布局。提升产业含新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行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提升发展含绿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快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亮点。强化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探索用水权、土地权、山林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改革，完善碳汇等市场交易机制，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无废城市”，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推动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

（作者系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论坛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和完善各级政府定期研究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千字当头狠抓落实，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将进一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坚守为民初心狠抓落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勤政为民、实干为民、服务为民、秉公为民，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发展业绩。

改进方法聚焦项目狠抓落实。建立“5+3”项目化抓落实机制，突出市场化导向，聚焦“四化”和基础设施5大领域在建项目以及工业、农业、服务业三类产业拟招商项目，各市（州）每个领域遴选10个项目，共80个项目，省级统筹协调推进，行业主管部门细化分类再抓一批，形成抓项目的强大合力。

提升工作效能狠抓落实。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真招实招，提高创造性贯彻落实能力。大力推进基层基础“强双基”，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干实事上，齐心协力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上接1版）

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继续发挥好“四化”等产业基金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力度，推动优质资源、精干力量集中到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来，推动新动能厚积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加快建设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主攻工业。锚定“3533”目标建设“六大产业基地”，促进酒、煤、电、烟等产业稳定增长，推动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释放新能源电池材料、新能源汽车产能，壮大食品加工、健康医药、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以上。推动数字经济取得新突破。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深入实施经营主体培育、业态升级、服务质量提升、项目提质增效攻坚“四大行动”，系统性提升重点景区品质，在丰富旅游业态、提高接待服务水平上下更大功夫，做好旅居康养这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14.2%。持续做好金融“五

篇大文章”，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积极谋划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数智赋能、检验检测、咨询服务、节能环保、人力资源等产业。

围绕高质量发展需求，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整体提升教育水平。深入推进整体提升教育水平攻坚行动，优化调整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大力提高教师水平专项行动，深入实施理工科强化行动，推进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学科建设，不断提高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围绕“六大产业基地”实施6大重大科技战略行动，财政科技资金80%以上投入“六大产业基地”等领域。深化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改革，建优建强国家实验室分支机构，重塑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省级产业类科技计划项目80%以上由企业牵头承担，新布局建设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类创新平台80%以上由企业牵头组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培育引进力度。“一人一策”支持顶尖人才后备人选，深入实施“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工程，加快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经济

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开展国资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协同监管，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大市、县国资国企改革力度，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实体化、市场化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有序推进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坚决守住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底线。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实施营商环境大改善三年行动，组建服务民营经济实体机构，用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制度，继续落实“两个40%”政策，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深度对接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发挥遵义和黔东南“黎从榕”两个“桥头堡”作用，推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取得更大成效。坚定不移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聚焦东南亚、南亚、中亚主攻方向，健全完善政府、商会、企业间沟通对接机制，用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重大开放平台，扩大酱酒、茶叶等特色产品和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推动工程技术设备开拓国际市场。

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增效益、

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在提升粮油单产上下功夫，坚决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粮油储备能力。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着力优化耕地林地布局，推进园地和林地上山、耕地下山，将25度以上陡坡旱地、河道湖泊内等不稳定利用耕地逐步调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起来推动，实现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双赢。建立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提高监测帮扶效能，加快建设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大数据信息系统，探索常态化帮扶工作举措，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收入。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助农增收。突出重点发展农业产业。把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保障贵州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坚持以质取胜，大力发展肉牛、辣椒、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快提升乡村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大力支持“两清两改两治理”，清理乱堆乱放、清理残垣断壁，推进改厕、改圈，治理污水、治理垃圾，开展卫生家庭建设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培育形成文明乡风。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把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深入实施“六六就业稳岗计划”，确保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600万省外务工劳动力稳定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围绕企业需求，大力推广“订单班”“定向班”，提高重点群体就业能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持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加快建设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二期项目、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支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与省外高水平医院开展帮扶共建，持续加强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健全完善五级医疗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大病不出省”。加强社会服务保障。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强化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启动实施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面。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稳步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断增强群众绿色获得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解决好群众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和发展